

目 录

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	周震麟 (1)
一九一二年筹组国民党湘支部办理选举的经过·····	
仇 鳌 (9)	
黄兴与明德学堂·····	黄一欧 (17)
回忆在明德学堂执教时的黄克强先生·····	阎幼甫 (25)
回忆秋瑾·····	王时泽 (30)
四十九标辛亥援鄂始末·····	余 韶 (40)
记杨任常德遇难·····	凌汉秋 (48)
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	余焕东 (51)
湖南时务学堂略志·····	唐才质 (55)
湖南陆军小学·····	戴凤翔 杨传清 陈鹏南 (59)
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的湖南报界·····	张平子 (65)
长沙辛亥光复后的片断见闻·····	陶菊隐 (91)
谭延闿阴谋推翻革命政权·····	张知非 (97)
——焦、陈被害前夕都督府的一场争论	
一九一〇年长沙饥民抗暴见闻·····	文 斌 (99)

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

周 震 鳞

(一)

湖南自咸、同以后，许多文官武将，出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称为“中兴功臣”。他们退職回籍后，地方官吏自巡抚以次，都特别尊重他们，不敢得罪。因此，绅权之大，常能左右一切。当湘籍留学生纷纷回省办学的时候，绅士中有一群特别顽固的人，以王先谦、叶德辉和孔宪教为首，拚命反对开办学堂；而一般青年志士，则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多办学堂。于是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界。一九〇三年春，胡元倬等开办了私立明德学堂，成了新派的中心。因为该校的教员如黄克强先生、吴禄贞、张继、苏曼殊和我，都是革命派。顽固派王先谦等，对明德学堂大加指责。两派相互斗争，曾引起多次风波。

明德学堂开办的这年夏天，谭延闿从北京会试归来，应邀来校参观，当表示热心赞助，并愿为学堂负筹措经费的责任。可是这时他的父亲谭鍾麟还在世。谭鍾麟也是一个顽固派，尽管搜括的民财很富，却不愿出一文钱办学堂。谭延闿的妻子方夫人，出身官僚家庭，赔嫁的金器首饰不少，谭就取出兑换，支援了明德的经费。我们看到他这样热心教育，就把创办其他私立学堂的立案、请款和拨给校舍等事情，请他出面和官府及绅士们打交道，

以便减少阻力，顺利地解决问题。这两年里，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国内外革命同志来到湖南参观的，莫不惊异赞赏；而且借参观的机会，进行革命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当时的谭延闿，不过是一个热心教育的绅士而已，关于这些革命活动，我们对他是严守秘密的。

辛亥湖南光复前夕，官绅们已经看到了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湖北首义后，湖南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对于新的主政人物的选择，官绅们自然要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作打算了。他们原来属意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想把他捧出来维持局面。当时龙璋和谭延闿，都曾向黄劝说过。直到焦、陈起义，杀掉了黄忠浩以后，官绅们才转而阴谋推戴谭延闿出主省政。

(二)

一九一一年夏历九月初一，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领导了起义。我在两个月以前奉黄克强先生之命，由北京经上海秘密回到湖南，在长沙约集各方面同志秘密开了多次会议，布置军事，约定夏历十月起义，并严诫毋蹈过去因事机不密以致失败的复辙。为了避免暴露，大家要我避居宁乡原籍，到期派人掩护入省。由于湖北提前起义，湖南势必提前响应。长沙光复的第五天，由洪春台、洪兰生派人持焦、陈两督的安民布告促我晋省。我到省后，看到督署新旧军人争功论赏，纪律很差；焦、陈两督军书旁午，穷于应付。两督见我到来，也没有和我商谈革命的具体问题。有一次，我因事到督署会晤焦达峰，他正在案头摆着一堆礼服样本，和裁缝工人一道，挑选研究都督制服的式样。我当时感到他已经有点陶醉于革命的初步胜利了。

湖南光复后，黄克强先生由上海到武汉主持军事，派谭人凤

到长沙，督促出兵援鄂。焦、陈两督正在一心调遣军队援鄂之际，不料新由益阳防地调省的第五十标营长梅馨纵兵叛变，两督以湖南起义首功，竟同遭杀害。梅馨利欲薰心，加以出身留日士官，自恃才高，不肯下人，竟充当了戕害革命领袖的刽子手，其结果终身为社会所不齿。

发纵指使这次叛变的主谋者，一般公认是谭延闿所主管的原諮议局；特别是副议长陈树藩（炳煥），为谭出力不小。当湖南光复，一般諮议局议员叫嚷推举谭为都督的时候，他表面上是既不肯，也不拒绝。实际上自从焦、陈以起义首功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的那一天起，諮议局议员就四出进行诽谤，特别是挑拨新旧两军之间的关系。他们攻击焦都督是“会党”，陈副都督在起义前不过是一个新军中的排长，并强调“维持秩序”，扬言焦、陈两督“年少望浅，不能服众”。大有不达到拥谭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目的不止之势。谭延闿就职伊始，即用都督印信给陈树藩的亲属下委札，不下五十余件，旋又用公费为他们派送了好几个西洋留学生；而陈树藩本人一直做着湖南省财政司长。这种种作法，在当时是人言啧啧的。

焦、陈两督被害后的头两天，市民惶骇，谣诼繁兴，说革命派要为焦、陈报仇，反动派还想继续残害焦、陈部属。谭延闿初任都督，一方面感到湖南局势还未稳定；另一方面感到革命党人对他的压力很大，终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

恰好这时克强先生来了一封长函给我和谭人凤，对湖南事作了详尽的指示。内容大致是：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

信中一再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并指定我留在湖南为谭延闿壮胆，调谭人凤返鄂参赞戎机。

我遵照克强先生的指示，表明了个人不做官、不争权、专做事的态度。于焦、陈被害的第三天，在金盆岭广场召集新旧两军开会演说，人民群众也围聚倾听。我首先代表同盟会和克强先生，旌恤焦、陈两督，以明是非。然后对他们说：现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敌人的兵力还很强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非常严重。大家都是爱国者，革命者，新旧两军决不容许互相歧视，互相排斥；而应该严守纪律，听候黄总司令编调援鄂北伐，共同奋斗。至于湖南的局面，谭延闿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得维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须目光远大，顾全大局，才能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和支持。最后把汉阳吃紧和湖南省库空虚的实际情况都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深受感动，热烈鼓掌。我本来带着几万元准备犒劳他们的，他们听说省库空虚，援鄂餉糈重要，一致表示不受。从此人心日趋安定，很快地组成了第二批援鄂部队，出发援鄂，与湖北起义军在汉阳并肩苦战，支持了十余日，又共同扼守武昌。

我还同谭延闿一道挽请了刘人熙出任民政司长，龙璋担任湘西巡按使。如上所述，谭延闿第一次督湘，革命党人迫于形势，是支持了他的。

谭延闿的统治地位既趋稳定，就逐步在各方面布置自己的势力。他的政治活动骨干始终是原来的谘议局议员，亦即宪友会会员。他选派了唐昆臣坐驻北京，通过汤化龙的关系，进而和黎元洪、袁世凯勾结。另外还有一些在京的湘籍官僚为他奔走。唐昆臣从北京向谭延闿密报消息的函电极勤，我在督署经常目击这种情况。至于他们内部的阴谋活动，谭延闿对我是保密的。

(三)

中山先生让总统位于袁世凯以后，同盟会旋改为国民党，又改总理制为理事制，中山先生任理事长，设国民党本部于北京，派宋逖初（教仁）代为主持党务。逖初头脑明细，手段灵敏，办党数月，袁世凯所支持、利用的共和党不能相与匹敌。临时参议院宣布召集国会，逖初南北奔走活动，党势益振，在国会选举中国国民党已操胜算。当时流言，如由国会产生政府，仍将选举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为正、副总统，逖初为国务总理。于是袁党和共和党都集矢于宋逖初了。

我于一九一二年春，被推为组织政府的湖南省代表，到了北京，曾和袁世凯面谈几次。他对于湖南地方关于财政、外务方面的要求，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以官位拉拢个人。我看出他对国民党深怀嫉忌，绝无拥护共和的诚意，不辞而别，回到湖南。当时宋逖初任农林总长，住在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办理党务。我在京时曾和他在畅观楼同住了一个多月，协助工作，并提醒他对袁世凯严加注意。国会选举完毕，袁世凯暗杀宋逖初案发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急电湖南，要我和谭延闿迅速准备长江上游的军事。我先到江西、安徽，和李烈钧、柏文蔚商议共同准备，然后到上海参加了布置讨袁的会议。会后，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仍派我回到湖南，积极准备行动。

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日益暴露。我催促谭延闿加紧布置军事，他却故意延宕，没有积极行动。后来虽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但不久又取消了独立。听说他在致徐世昌的密电中有这样一段话：“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这就表明了

他当时的两面态度。在取消独立的前夕，他害怕革命党人据湘讨袁，便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毁了我们艰苦经营的军械局，企图用消灭革命武器的办法，迫使革命党人离开湖南。取消独立之后，谭延闿还想恋栈投降，但是，袁世凯却认为他不可靠，并且要把北洋势力伸展到西南门户的湖南，就改派了汤薌铭督湘。谭延闿在汤薌铭抵湘前离省，后来竟无耻地入京向袁世凯请罪。汤薌铭下车伊始，就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残酷地镇压革命。

(四)

一九一六年讨袁军事结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回到上海，筹商对付北洋军阀的策略。我主张克强先生亲自督湘，以便领导西南各省，应付非常。这时谭延闿也在上海，表面上附和，背地里却从北京通过黎元洪由段祺瑞发表了他自己二次督湘。接着黄克强、蔡松坡两先生相继逝世，革命党人失去了军事长城，直皖两派军阀更加轻视西南，曹锟陈兵湘鄂之间，北洋军阀势力日益嚣张。谭延闿也因黄、蔡两先生的逝世而减轻了对湖南革命党人的顾虑，专心致志地去巩固他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了。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承袭袁世凯的故技，撤换了谭延闿，改派傅良佐督湘。傅良佐在湘没有实力，不久就因刘建藩、林修梅在零陵起义而被驱逐下台。段祺瑞又派拥有兵力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这时直系军阀吴佩孚进据湖南衡阳、宝庆一带，谭延闿率部据守湘南郴、永一隅。适值直、皖关系日益恶化，谭延闿联合直系，吴佩孚让出衡、宝，回师鄂、豫。到一九二〇年六月，谭乘张敬尧被驱逐的机会，实现了三次督湘。

湖南自谭延闿取消独立以后，经过汤薌铭、傅良佐和张敬尧等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人民受尽了痛苦，革命党人或惨遭屠杀。

或被迫流亡。其他各省情况也相类似。但是，中山先生始终没有因革命实力遭受挫折而气馁，而是百折不回、再接再厉地领导着革命继续前进。

（五）

一九二〇年，中山先生在上海决定北伐大计，先使陈炯明、许崇智率援闽粤军回粤，驱逐旧桂系莫荣新、沈鸿英等；随即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凑足法定人数，正式开会于广州，选举总统，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大举北伐。这年夏天，我代表中山先生到福建漳州会晤陈炯明和许崇智，商定回粤计划。陈、许主张我回湖南说服谭延闿分兵入北江声援，并议定由中山先生筹措开拔费用；湘军进入粤境，即可由粤方供给饷糈。我回上海报告，中山先生完全同意，命我积极进行。我先用个人名义，写信给谭延闿，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和对湖南的要求。谭延闿回信唯唯从命。我即持中山先生手函回湖南面交谭延闿。我到长沙不久，中山先生又派李执中、覃振、柏文蔚和张继先后来长协助工作。我就放手召集各军的军官和士兵开会，宣布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以及对于湖南军人发扬革命传统的期望，给予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当时驻省军官鲁涤平、陈嘉祐，驻醴陵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都积极拥护中山先生北伐，各自调遣所部，集结省城待命。而谭延闿则态度冷淡，故意延宕，不肯发布出兵明令。直到一九二〇年八月，援闽粤军如期发动了，谭延闿还是处之淡然，邀请吴敬恒、章太炎等来湘演讲，游山玩水，酒食征逐，无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我催促他早日出兵，说得舌敝唇焦，他还是推诿不决。于是我决计和湘军将领合作倒谭。议定推赵恒惕为总司令、林支宇为省长。与此同时，张振武杀了不服调遣的萧昌炽，廖家栋率第三旅会合

各军，逼近省城。我认为倒谭时机已经成熟，就委托护法国会议员陈嘉会劝谭延闿自动离开湖南。谭打电话向我哀请等安葬了他的夫人再走，因为他的夫人死在上海，灵柩正在运回湖南的途中。我回答他说：“为了维持省城秩序，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务必马上离开。至于使你不能够为夫人亲营葬事，我不久回上海当面道歉。”他只得忍痛登舟，回到上海去了。

倒谭以后，陈嘉祐等率兵到了韶关，声援援闽粤军回粤，驱逐了旧桂系莫荣新、沈鸿英等。于是中山先生重返广州，组织大元帅府。不料赵恒惕在我赴粤复命的时候，竟背信弃义地在长沙惨杀了李仲麟等，又成了中山先生北伐的障碍。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以后，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同志多集中在上海。不久，许崇智奉命率粤军和新桂军讨逆。叛将洪兆麟赖世璜等，向我和李烈钧表示悔改，愿意立功赎罪，欢迎我和李烈钧去粤。同时，留粤滇军欢迎杨庶堪。谭延闿这时也在上海，向我表示悔悟。我正感革命武装力量薄弱，认为谭延闿如果真有悔悟之心，忠诚地参加革命，还可以号召湘军旧部鲁涤平、陈嘉祐等，提兵相助，以壮革命声势。因此，重新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晋谒中山先生。谭延闿在辛亥革命后加入过同盟会和国民党，但和中山先生的会见，这还是第一次。一九二二年夏历除夕，李烈钧、杨庶堪、谭延闿和我四人，随同中山先生由上海搭乘海轮驶赴广州。

谭延闿到了广东以后，还是不忘情湖南的地盘。他的党徒曾包围中山先生，想借中山先生之力恢复他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关于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仅就个人接触所及，回忆如上。湖南的老年人士，知道详情的还有不少，尚望补其缺漏，正其疏失。

一九一二年筹组国民党湘支部 办理选举的经过

仇 鳌

辛亥革命以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军阀篡夺了政权；同盟会内部起了分化，组织趋于涣散，成员中有一些人实际上离开了组织，有一些人则另树旗帜，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团体。原来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取消了，其成员分别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等团体。不久，这些原非同盟会的团体和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团体，合并组成统一党，以后又进一步扩大组织，并改名为共和党。与此同时，还产生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民国公会、共和促进会和国民新政社等较小的团体。

当时参议院中，还是以同盟会为第一大党；与同盟会相抗衡的共和党为第二大党；介乎二者之间的统一共和党为第三大党，此外就是以上列举的那一些小党派。同盟会虽然是第一大党，却没有能够占到压倒的多数。同盟会面临着同袁世凯及与其相援结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内、外的斗争，同时又处于小党林立的形势。这对同盟会显然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同盟会的主要骨干分子宋教仁主张联合政治主张相接近的一些小党派组成为一个压倒一切的大党。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便和参议院内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

小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任务就是争取在改选后的参、众两院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多数议席，并进而使本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宋教仁和其他党内同志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的精神，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办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又必须把全国各地的党部，好好地组织起来。

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以后，马上做出详细计划：第一、派人到各省成立国民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准备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并且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同盟会还在未改组以前，就已注意物色各省组党和掌握选举的负责人。当时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比较复杂混乱，象湖南就是如此。对于这些情况复杂混乱的省份，人选更宜郑重考虑。

湖南在辛亥起义以后不久，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两都督，被反动分子杀害；原属宪政派的谭延闿，因利乘便，继任都督。当时湖南政局极不安定。同盟会对焦、陈被害，深为愤慨。反动势力虽然阴谋杀害了焦、陈，但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不能不使他们反侧不安。湖南响应首义比较仓促，同盟会对政治工作的准备不足，干练一些的人当时又都不在湖南；比较有办法的，只有一个原任司法司长的洪春台，隐隐成为湖南同盟会

的重心，不幸在这时候死了。湖南方面向北京请示，要求派人回去主持。

同盟会在北京的负责人要派我回湖南，负责党务和选举工作。那时国民党改组正在进行，成立大会还没有开，总部还没有成立。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对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和进一步经过竞选而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以实现政党的责任内阁的计划，我是始终与闻，而且完全赞同的。但是我当时在北京办报（亚东新闻），无意办党和从政，所以对于回湘的使命，再三推辞，不肯担任。经过北京负责方面的再三敦促，并同意了我所提出的在办理改组和选举工作后引退的条件后，我才接受任务，于一九一二年六、七月间回到湖南，筹备党的改组工作，并负责掌握湖南的选举。

当时湖南政治上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这里不得不追述一下会党在湖南首义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影响。

同盟会和以前的华兴会，一贯以联络、利用会党作为革命的主要策略之一。一九〇六年湖南哥老会的焦达峰加入同盟会，后来被推为调查部长，专负联络各省秘密会党的任务。他联络各省会党首领，共同发起组织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运动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会党，共同参加革命工作。一九〇九年，焦达峰往来湘鄂之间，在汉口设立共进会的总机关，在长沙设机关部。在共进会的策动下，两湖的革命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九一〇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长江流域各省的起义；并以共进会和其他的会党团体为基础，成立湖南、湖北两省分会，委派焦达峰主持湖南的革命活动。

这种联系和利用会党的策略，在当时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大起义，就是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由当地

的哥老会、洪福会、武教师会等团体搞起来的；武昌起义和湖南响应时，都曾得助于会党的力量。所以湖南起义后，焦达峰被推为湖南都督，是顺理成章的。

会党在辛亥革命时，虽然表现了它的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起义以后，要搞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时，它就一筹莫展了。所以反动派得乘机钻入，阴谋破坏，利用反对所谓“江湖作风”为口实，进行煽风点火，造成杀害焦、陈的事变。

事变以后，湖南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而同盟会却拿不出政治上的一套办法。当时我把北京方面所决定的一套办法拿出来，同时针对湖南的具体情况，提出我的主张和办法。当然，在当时的动荡和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拿出政治上的一套办法，是各方面一致欢迎的。

我回湖南不久，经过多方联系商洽，自同盟会内部以至政治上、社会上的各方面人士都认为我所拿出的办法很好。因此，我能够得到各方面的合作，而顺利地实现此次回湘所负的使命。

为了实现此次回湘所负的使命，首先必须把湖南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团结在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之下，形成一个联合战线，以便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极端反动的军阀、官僚势力作斗争。

原属同盟会会员和不属同盟会的革命派人士，是国民党的基本队伍，当然是我首先应该团结的力量。他们对于原来的“江湖作风”有些不满，但又苦于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在和我接洽之后，马上消除过去的徬徨苦闷的情绪，满怀信心地团结到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发挥各个人的力量。

同盟会内的会党分子，对于焦达峰的被害，一直气愤不平。我过去参加革命工作时，既搞政治，也搞江湖，略为懂得江湖的一套。我回湖南后，特别拉拢他们，但同时把现在不能搞“江湖”

一套的道理，向他们反复说明。经过一番努力，一方面缓和了他们的不平之气，一方面使他们接受我的一套政治办法，而积极参加到组党和选举的工作中来。

原属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的人们，过去都是一些改良主义者，但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中间许多人不得不隐蔽君主立宪的思想，对于议会民主制表示赞同。因此，经我稍加拉拢之后，大多数都转到我们的旗帜下来了。

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他过去是宪友会在湖南的主干。革命成功以后，他的思想情况，当然与上述的宪友会分子基本相同。在焦、陈被害以后，湖南政治上没有重心，他就应运而起。我当时对谭这个人的看法是：他对于孙中山、黄克强和同盟会的力量，是看得到的，因此不敢过于立异，公然站在反动的一边；但是要他真心地站在革命方面来，当然也不可能。在焦、陈被害以后，同盟会与谭延闿有矛盾，不过比起同盟会与袁世凯的矛盾来，就是次要的了。

我回湖南把国民党的一套办法对谭延闿谈了，他很表赞同。以后，凡是我们提出的办法，他都欣然乐从。后来黄克强、宋教仁先后回湘，当然与他过去认识的民党人士不同，使他对国民党的观感有所改变。他说宋教仁是“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上的人物可比”，因此他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我们也决定拉他进来。谭在湖南代表改良派和其他一些旧人，把他拉过来以后，这些人也就跟着过来了。

我以前没有在湖南工作过，这次回来，对于湖南的政界、军界、社会人士和江湖朋友都是初次碰头。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于是一面着手改组国民党，一面布置选举。

因为我是北京国民党总部成立以前两个月就回到了湖南，从事湖南党的改组工作的，所以在总部成立的通知到湘后，不到一个月，即在九月下旬，国民党湖南支部就正式改组成立了。

为了扩大党的基础，并便利党的政策的推行起见，在成立大会上，推举谭延闿为支部长，我为副长。实际上，党务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以下还有总务主任周声骏、政事主任刘武、交际主任周震麟、会计主任陈树藩、文事主任吴景鸿。支部内还设有评议会，评议长龙璋，评议员刘人熙、陈强等五十七人。又设有政务研究会，会长杨德邻，副长罗杰；法制主任彭兆璜，政务主任陶思曾，经济主任周砥，外交主任陈安良，军务主任陈嘉祐，教育主任萧翼鲲。从以上机构的设置和人事的安排，也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所联系的方面之广。

湖南支部成立以后，谭延闿仍任都督，我任民政司长。各县县知事（县长），都是由民政司直接委派的。我当时和谭延闿分工，军事方面由他去对付，政治和社会方面都由我负责。

接着我们就以全力布置选举。这是一个重大工作，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是只可成功，不可失败的。成功的关键在哪里？首先在于民政司。民政司是主办全省选举的机关，民政司长是法定的选举总监督；各区的分监督也是由民政司选派的。其次，在于各县县知事，知事主办一县的选举，并兼县选举监督；可是知事又是由民政司委派的。再就是由湖南支部派往各县组党的人，直接代表党来竞选。

在这里应该补说一点，在我回湘以前，北京方面曾有一个误解，以为选举是由司法司主管的，所以他们布置，要我接任洪春台的司法司。回湘以后，才知道不是这回事，北京的布置错了。那时湖南民政司是刘人熙，乃是湖南的老辈。为了完成选举的任

务，由刘人熙让出了民政司，改由我来担任。这样，在选举工作上，才能收到指臂之效。

我到民政司以后，把各县知事作了一番调整。随后派出了五区的选举分监督：一区龙璋，二区苏鹏，三区唐璧，四区戴展诚，五区黄右昌。于是省、区、县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了。同时，由党支部分派了各县的组党人员，成立县的党组织，并立刻展开竞选工作。到了临近选举的时候，每县都派了选举大员，党也派了视察员下去。我就是这样布置了全省的选举。

从一九一二年十月到一九一三年二月，全省选举完成。从国会、省议会一直到各县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

湖南的选举工作是以压倒的优势胜利完成了。同时，全国各省，国民党在选举中也都得到了胜利。根据统计，众议院596个议席中，国民党得了360多席，除去跨党的不计，还有267席；参议院274个议席中，国民党（除去跨党的）得了123席。如果在宪政正轨中活动，不遭到袁世凯的阴谋和武力破坏，国民党既然得到参、众两院的压倒多数，则正式政府的责任内阁，当然非国民党莫属了。

当湖南及其他各省的选举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宋教仁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回到湖南，参加竞选。因为临时约法规定，担任组阁的，应该是国会议员。宋教仁回湘后，湖南省议会举他做参议员。由于众望所归，一声喊就把他抬出来了。

宋教仁当时到各处演说，对于时政得失，尽情发挥，无所顾忌。他明白提出：正式总统虽可举袁世凯，但内阁必须以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以符立宪政治的正轨。同时分析当时选举形势，说明国民党已经肯定要在国会中占到多数议席，因此他决定准备组阁，毫不含糊。这本是当时所谓先进立宪国政治家

应取的正常态度，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又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商谈组阁计划，同时研究如何把湖南的政治地盘搞好。他邀谭延闿担任责任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因为谭的父亲谭锺麟和袁世凯的上辈袁甲三系拜把兄弟，他想利用谭和袁世凯的世谊关系，在府、院之间起调协的作用。他还提出把湖南民政司长升格为民政长，统辖各司。在都督进京担任内政部长期间，由民政长代理都督职务。

当时谭延闿及其他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了这个计划，但我没有表示同意。宋、谭当时再三劝我同意这个布置，我坚决不肯，并说，等选举结束后，一定要离开湖南。争论了一晚，他们最后叫我不要反对这一整个的布置。我说，对于计划本身，我不反对，但对我个人有关部分，必须重新考虑。谁知他们认为不反对就是赞成，宋教仁根据那晚所谈，即时把他的全部计划，电告国民党北京总部去了。

原来袁世凯派有侦探驻在长沙，探得了宋教仁准备组阁的全部计划，报告了袁世凯，因而促使了袁世凯急于刺杀宋教仁，不能等他回到北京。因为宋一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无法加以阻止的。

不久，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袁世凯大肆搜捕国民党人，公然毁弃约法，停止国会，实行独裁。国民党的实现议会民主制的想法就这样终于破灭了。

至于我个人，原来打算在湖南选举结束后，即行离湘，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更促进了我的去志。袁世凯对于湖南国民党人士，必欲得而甘心者，有当时叫出的“麟（指周震麟）、凤（指谭人凤）、龟（指我，因为‘鳖’字的本意为‘海中大龟’）、龙（指龙璋）”四人，也使我在湖南待不下去。因此之故，不久我就离开湖南了。